



尘外三昧

——《菜根谭》一日一语

梁一群



尘外三昧

——《菜根谭》一日一语

梁一群

C912

1058

C912

1058

RB615/05

浙江人民出版社

01/05

责任编辑:周向潮
封面设计:池长尧
责任校对:张谷年

尘外三昧
《菜根谭》一日一语
梁一群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4 字数 31 万 印数 10001—30000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213-01330-0/G·337 定 价:18.00 元

《菜根谭》之谭

《菜根谭》，明人洪应明著。

关于作者，据刊行于明代万历年间的《遵生八笺》所收《菜根谭》一书最早版本，题作“还初道人洪自诚著 觉迷居士汪乾初校”。

洪氏另撰有《仙佛奇踪》一书，《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有存目，其提要说到：“《仙佛奇踪》四卷，……明洪应明撰。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其里贯未详。”《仙佛奇踪》，可以确定系洪氏万历三十年（1602）居于南京秦淮一带时写成，该书的两大部分《逍遥墟》和《寂光镜》，分别有了凡道人袁黄、真实居士冯梦祯所撰的“引言”，在前者所撰《逍遥墟引》中，有“洪生自诚氏，新都弟子也”的说法，有人因此推断洪氏曾就学于明代大学者杨慎（升庵），不过，此说尚未有确切的证据。

《菜根谭》最早的一种版本，有三峰主人于孔兼的题词。于氏为江苏金坛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明史》卷三百二十一有本传。于氏在朝，做过礼部主事（各部司官中最低的一级），后迁为礼部仪制司郎中（又称“仪郎”，掌礼文、仪式等），因为几次上疏得罪明神宗，后来因为营救赵南星一事，明神宗“积前恨”，谪于孔兼为安吉判官，于即“投牒归”，也就是把授官的簿录抛弃，径自辞官回家。他此后“家居二十年，杜门读书”，《菜根谭》题词，当作于此时。其中说

到：“适有友人洪自诚者，持《菜根谭》示予，且丐予序。”

于氏题词称：“谭以菜根名，固自清苦历练中来，亦自栽培灌溉里得，其颠顿风波，备尝险阻可想矣。”结合《仙佛奇踪》中冯梦祯《寂光镜引》所述“洪生自诚氏，幼慕纷华，晚栖禅寂”，我们可以想见洪氏从热衷于尘世纷华，到后来的洗心礼佛，其间是经历了难以言喻的风波颠顿的。这些情形，不能不在《菜根谭》中隐略而曲折地有其映现。

据我们现在人看来，于孔兼与洪应明，似乎还称不上是过从较密切的朋友，至多也不过是“淡如水”之交。洪氏之于袁黄、冯梦祯，则似乎只以后学晚辈之礼相见的，也谈不上有多少较深入的来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于孔兼与东林学派的交往是较深的，《明史》把他列于东林第一人顾宪成传后，其用意不言自明。而洪氏得与于孔兼一流人物往来，则其为人以及所好，也就约略而可想见了。

关于《菜根谭》的作者，我们从侧面所能够了解到的，大致也就是这些。

二

《菜根谭》一书，据于孔兼看来，是“谭性命直入玄微，道人情曲尽岩险”。性命，是传统中国的学术范畴之一。《易经》中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好像是有关性的最早论述。南宋的朱熹解释道：“物所受为性，天所赋为命。”性命之学，即见性立命之学，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关于人的存在的学说，是关于人生根本意义的学说。

关于人的生命存在之意义，这个古老的话题恐怕将长期伴随人类而一同存在下去，这就因为有关的感悟和领受，都是独特的，因而是不可替代的，也因此，就不可能有一统之论。拿这种观点来看洪氏《菜根谭》，看其所表述的人生感受和生命领悟，可以使

对此书中所反映出来的愿望和见解、惶惑或坦然等等，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从而获得较为确切的把握。

洪氏此书，世间多有归之为“禅宗语录体著作”的，其说大约始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遂初堂主人”所说：“余过古刹，于残经败纸中，拾得《菜根谭》一录。翻视之，虽属禅宗，然于身心性命之学，实有隐隐相发明者。”这里所说“身心性命之学”，当意指宋明以来专究性命之学，也即理学。

遂初堂主人此说，与于孔兼的看法大不相同。于孔兼并未拈出洪氏此书有禅宗这一主旨，而是概略言之有“性命”与“人情”两方面的内容，也即是：一为形而上的玄微之义，一为世间日常必备的有关知识。于氏之说，与稍早于遂初堂主人的“三山通理达天”写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菜根谭序》中，所引的不翁老人说法相近：此书“其间有仁语义语，持身涉世、隐逸显达、迁善介节，禅机旨趣，学道见道等语”。

但是不翁老人之说，未免有就“言”论“言”之不足；而“三山通理达天”的兴趣点，又集中在《菜根谭》的书名上，对于此书的主旨，并未有自己的见解。关于书名，他写道：“菜之为物，日用所不可少，以其有味也。但味由根发。故凡种菜者，必要厚培其根，其味乃厚。”他认为，此书中所谈到的“世味”以及“出世味”，也即我们所理解的“入世”与“出世”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况，及其所应该持有的心态和所得的意趣，都是属于“厚培其根”的论述，不可不予重视。说到对此书的重视与否，“三山通理达天”还说道：“又古人云：‘性定菜根香。’夫菜根，弃物也，而其香非性定者莫知。如此书，人多忽之，而其旨唯静心沈玩者方堪领会。”这就把书名中的“菜根”之含义，作了一番独特的发挥。

“三山通理达天”所发的感慨不无来由。《菜根谭》一书在中国，确曾是“人多忽之”的。清代乾隆年间所修《四库全书》，《菜根谭》连存目都未列入。此后的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也未提到此书。与

此形成对照的是《菜根谭》一书在日本的走红。日本学者此书的书名、主旨等等，都有他们独具只眼的见解。

日本大正十五年(1926)刊行的宗演法师《菜根谭讲话》，有福田雅太郎所作序言云：“中国宋代儒者任信民说：‘人能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明代的洪自诚就是根据这句话来为《菜根谭》取名的。书中阐述了精神修养与处世要诀。”福田氏所说“任信民”，应为汪信民。汪信民，名革，江西抚州临川人。福田氏关于《菜根谭》命名的说法，得到了中村樟八、石川力山的赞同，中村氏和石川氏写道：

朱熹撰《小学》善行第六章末有“汪信民尝云：‘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胡康侯闻之，击节叹赏。”……朱熹为汪信民语批注云：“学者须常以志士不忘在沟壑为念，则道义重而计较死生之心轻，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何事犯义犯分，役心役志求之也。某观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违其本心者众矣。可不戒哉。”菜根是指蔬菜的根，与肉食类的美味佳肴不同，是一般的粗食。汪信民的本意是，能够顽强地适应贫困生活者，凡事必能有所成就。这同《论语·雍也篇》所记颜回的人生准则“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以及《述而篇》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大同小异。

关于《菜根谭》一书命名之由来，上述见解，皆有其理由，而对照《菜根谭》来看，也都能说得过去。这反映了该书名中“菜根”一辞所容有的信息含量，及其在各人心中所唤起的形象和涵意，都是难以一言确定的。在这里，文本和解读者都可以，事实上双方也正是表现出了相当的指向不确定性，这也为解读本书留有相当大的余地。为着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玩味该书作者洪应明的友人、三峰主人于孔兼的说法：

谭以菜根名，固自清苦历练中来，亦自栽培灌溉里得，其颠顿风波，备尝险阻可想矣。洪子曰：“天劳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厄我以遇，吾高吾道以通之。”其所自警自力者又可思矣。由是此数语弃之，俾公诸人人，知菜根中有真味也。

看来与洪氏有往还的于氏，在这里特为拈出《菜根谭》中这一段话，并非无缘无故，而是基于他对洪氏的了解，有其意思所在的。联想到于氏所说“清苦历练”、“栽培灌溉”以及“颠顿风波”、“备尝险阻”之语，则我们仿佛可以想见洪氏由“幼慕纷华”到“晚栖禅寂”的剧烈转变，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需要加以调适的心态等等。菜根，或者可以认为是自我调适必备之物，也就是应该充斥于始终的一种“信物”，或者说，是作为一种自警自醒的“意象”？文人处世，当那股少年盛气熬尽，身心均感疲惫不堪之时，往往会自然而然产生这种心理要求，否则，就难以对自己“解释”得过去，因而也就容易为心理上的危机所击倒。

传统的中国文学作品，充满着这类隐而不露，因而便于解读者自由发挥想象的例子。所以一般来说，只要解读者对于中国文化中的那些“意象”有大致的了解，几乎无不能从例如“菜根”这样的简单词语里，感悟到似乎不可言说，然而又非常确切地领受了的“可读意义”。

关于《菜根谭》的内容，福田氏所谓“书中阐述了精神修养与处世要诀”，与于孔兼“谭性命直入玄微，道人情曲尽岩险”说法，基本一致。然而福田氏又说：

通过《菜根谭》我们可以得知作者非常精通儒、佛、道三教，他的阐述，每句话，每个字，均能充分发挥三教的精华，可谓千锤百炼，斑斓绚丽。此书确可算得是修养身心书中之冠了。

福田氏大约以为洪氏此书是融合三教为一体的，而评价之高

也可谓少有。儒、佛、道三家对中国文化影响之大，是尽人皆知的，此三家学说对于中国文人的塑造，也不是什么秘密。问题在于《菜根谭》对于儒佛道三家学说的理解和接受，以及自我融合的情形，究属如何？对此，中村璋八和石川力山的意见，与福田氏的见解大有相异之处：

《菜根谭》的内容是儒佛道三教混然一体的，但同时也有着思想上的混乱的部分。如果以“吾儒”反复出现，以及于孔兼的题词来判断，三教兼修，只是作为当时知识层和士大夫阶级的一般修养，实际应是儒家思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中村氏和石川氏，把洪应明放到明代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来理解，把洪氏同东林党人当时的遭遇，即受到朝中权势者的压迫这一事实联系起来看，同时又点出处在明代内政混乱漩涡中的儒士这一特定身份。因此他们从“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附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一段中，看出了“东林学派清高的精神思想”；又从“恩里由来生害。故快意时，须早回头。败后或反成功。故拂心处，莫便放手”一段中，“推测出作者受非东林派压迫的难言之隐”。他们认为，《菜根谭》中即使是“被人们看作处世的训条，实际也具有极其鲜明的现实色彩”。中村氏和石川氏的意见是：

《菜根谭》作为清言集的真面目，是把被迫归隐后实实在在的的心情和佛、道思想融为一体，寄托在发自内心的言语之中。

中国的儒家有一句话，曾被历代文人奉为至宝，这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前半，老实说大多是作为一种希望存于心中而已的，至于说要实现，恐怕连孔孟都开不出这个大口。于是，文人的行为中，能够做到的，也就只有后半了。然而这“独善其身”，可着实不容易。儒家对于礼乐制度，对于积极人世的一

面，多有讲述，唯独对于个人的心性修养，对于积极入世之外的另一面，却是语焉不详。或者即使有所发挥，如子思、孟子一路学派，也多是着眼于“修齐治平”一路，对于相反的心理趋势及其要求，似乎是不屑一顾。早在二千多年前，《庄子·田子方》的作者就曾感慨过：“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当然，儒家之言，都是有所为而发的，其不能兼顾它所不屑现象的存在，也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后世以儒家为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工具时，却颇有些苦了读书人了。

因此，佛道思想的传播和被接受，也就同样是理所当然的。从魏晋以来的清谈玄理之发挥，以及东晋时大量佛经的输入和流布，中国文人对于佛道思想，大都已耳熟能详。至于北宋时期的张方平对王安石所说的“儒门澹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只不过是对于个体精神界中的塑造者作用力量之转移这一状况作了一下点明而已。此后中国文人所谓的“三教兼修”，表现在进退出处方面，大约多少总有些“兼修天下用儒学，独善其身采佛道”的意味在。作为这种意味的产物是“宋明理学”。所谓“宋明理学”，不能一概而论之，而其大体，则为兼采佛道无疑。《菜根谭》作者洪应明，生当明代王阳明学说风靡天下之后，又在东林学人讲学之际，又结交与东林党人有密切关系的于孔兼，我们从《菜根谭》一书“谈性命”、“议人情”情形来看，明显地可以感觉到作者“独善其身”之际的佛道思想强烈影响，而儒家思想，已成为时不时偶尔有所流露，或者是爆发一下的火花罢了，仿佛仅仅是对往昔感情依恋的某种回应和愿望。

因此说，《菜根谭》中的“三教兼修”情形，绝非表现为三者融合一体，而是有所偏重的。其中作为中国文人的入世支柱儒家思想，已退居而变得面目难以辨认，而大量地充斥于字里行间的，则是中国文人退隐之后的精神支柱佛道思想。当然，作者在佛道二家之间，也未表示出何轻何重的意思来，这与一般的文人不过分讲究何宗何派，唯以适志愉心为目的内心要求是相吻合的。中村氏和石川

氏的见解，很有独到之处，他们认为洪氏的言论表明：

他对现实生活的理想，也就是号称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潜在《归去来辞》、《归田园居》、《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世界。在儒生中，经常被引用的还有邵雍。此人咸淳年间从祀于孔子庙，明朝嘉靖中，尊为先儒邵子，是清高之士，自号安乐先生。虽几经推荐他为官，但始终辞谢不任，一直作为隐士，受到了尊敬。

从洪应明钦仰的、并屡次在《菜根谭》中加以引述或描绘的那种理想境界来看，应当认为洪氏当时已经从“儒学为用、佛道为里”，转而成为“佛道为用，儒学其里”。中国文人，由于有着儒佛道三家学说可以互为其用，因而一直是左右逢源的，绝对要求自己从内心撇去其一学派影响，简直是少而又少。因此，我们说《菜根谭》是文人儒生在失意退隐之后，倾向于佛道思想的心态之流露。至于洪氏是否把儒佛道三教的精华发挥得淋漓尽致，领悟得水乳交融，则又是另一番话题了。总之，《菜根谭》是有意无意地搁置了儒学，而涵泳于佛道之间的作品，是文人儒生不得已而暂别了外拓一路，转而进入内觅一路的产物。

三

当文人儒生从外拓一路转而内觅一路时，儒学的疏漏之弊，在佛道，尤其是佛理对于人生观照的深入细微对比之下，显得格外明显，这是宋明理学起而补救也改变不了的。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其“内圣外王”工夫就多从“内圣”入手。这一方面固然是有感于佛道学说的刺激，另方面，主要是因为世上毕竟是不得志的儒生居多，而且这部分人往往竟是所谓的守道义和有学问者。如果这部分人的心思，居然是“儒门澹泊，收拾不住，尽归释氏”的话，则无疑是儒学的根本之症。因此宋明学者，多援佛入儒，或引道入儒，由此建

立起一个新型的儒学体系。

然而儒学毕竟是与权势结合得太密切了，而北宋以降，特别是明代，所谓的“官学”也无非是牢笼人心的那套做法，士子一旦入其彀中，则无不沉浮于仕途官场内外，由不得自己，几乎形同典身，这又如何使稍有头脑者甘心？于是，宋明学者对于儒学的设计，即使再完整再精妙，落到实处，还是重蹈覆辙，走前代儒学的老路。

礼失则求诸野。不一定是中国之外的那些“野”吧？可以说是“失之朝而求诸野”。想当年孔子兴儒学，就是兴办私学，其实也就是另搞一套的。这种风气，在孟子那里也存在着，他说过，统治者如果像桀纣那样，是可以把他们推翻的，理由呢？是我们熟知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谁给了他这种权力？是后来唐代韩愈所谓的“道统”吗？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道义的力量”？当然，孟子他们的立足点，还是在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上，他们向往的是一个由此而产生的“仁慈政府”。孟子他们，当初是把自己，也就是那些自认为是掌握了天地间的道义及其可靠标准的人们，当作一种可靠的舆论督促力量来看待的。这也是先秦时代士人的一种自我估价，在那时也是比较能够反映现实需要的。可惜，大一统迎来的并不是一个“仁慈政府”，这一点到了朱元璋所建立的明代，更是明显。文人儒士在明代，简直噤若寒蝉，至少在朝政方面是如此。“达则兼济天下”，对明人来说，不啻是一种莫大的嘲讽。而失望之余，转入佛道、寄迹山林或市井之中，倒是明人的拿手好戏。其实当时不仅《菜根谭》，在它前后，就有一大批所谓的“清言集”问世，它们都是文人儒士看似信手随意写就的语录体作品，如徐学谟《归有园麈谈》、苏浚《鸡鸣偶记》、吕坤《呻吟语》、来斯行《槎庵燕语》、屠隆《娑罗馆清言》、《续娑罗馆清言》、吴从先《小窗自纪》、何伟然《呕丝》、陈继儒《岩栖幽事》、《安得长者言》等。《菜根谭》，也可以说是这股潮流中的一朵浪花吧？

把《菜根谭》一书放到明代这股语录体著作的大潮中，当更能

使我们了解该书。这里不妨先撷取众多语录体著作中的几滴水珠，藉以观照《菜根谭》：

面而誉之，不如背而誉之，其人之感必深。

多而施之，不若少而施之，其人之欲易遂。

遇沉沉不语之士，切莫输心；见悻悻自好之徒，应须防口。

（徐学谟《归有园题谈》）

风光月霁，是吾心太虚真境。鸟语花阴，是吾心无尽生意。

无事时常观照此心，兢兢然若有事；有事时却放心，坦坦然若无事。

（苏浚《鸡鸣偶记》）

胸中只摆脱一“恋”字，便十分爽净，十分自在。人生最苦处，只是此心沾泥带水，明是知得，不能割断耳。

（吕坤《呻吟语》）

苦恼世上，意气须温；嗜欲场中，肝肠欲冷。

老去自觉万缘都尽，那管人是人非；看来尚有一事关心，只在花开花谢。

楼前桐叶，散为一院清阴；枕上鸟声，唤起半窗红日。

常想病时，则尘心渐灭；常防死时，则道念自生。

风流得意之事，一过辄生悲凉；清真寂寞之乡，愈久转增意味。

草色花香，游人赏其有趣；桃开梅谢，达士悟其无常。

（屠隆《娑罗馆清言·续娑罗馆清言》）

上引几位文人，都可算得《菜根谭》作者的前辈。敏感的读者不难看出他们的见解和用语方式，与洪氏《菜根谭》如出一辙，其中有几句，简直就如同照搬。为拓展我们阅读《菜根谭》的思路，我们还可以看看与洪氏年龄大致相当的部分作者之言，首先来看看被看

作“为人慷慨淡漠，好读书，多著述，世以文称之；重视一诺，轻挥千金，世以侠名之；而不善事生产，不屑争便径，不解作深机，世又以痴目之”的吴从先的《小窗自纪》：

存心有意无意之境，微云澹河汉；应世不即不离之法，疏雨滴梧桐。

“逸”字是山林关目；用于情趣，则清远多致；用于事务，则散漫无功。

落落者难合，一合便不可分；欣欣者易亲，乍亲忽成怨。故君子之处世也，宁风霜自挟，无宁鱼鸟亲人。

世情熟则人情易流；世情疏则交情易阻。甚矣，处生之难。

点破无稽不根之论，只须冷语半言；看透阴阳颠倒之行，惟此冷眼一双。

肝胆相照，欲与天下共分秋月；意气相许，欲与天下共坐春风。

再一位是何伟然。他有《呕丝》一书，其中说到：

应世法，微微一笑；度世法，冷冷半语。

观变态之极幻，则浮云转有常情；咀世味之皆空，则流水转多浓旨。

另一位是陈继儒，他以“陈眉公”之号名世，《安得长者言》是他“有闻辄掌录之”的结果。其中有：

宦情太浓，归时过不得。生趣太浓，死时过不得——甚矣，有味于淡也！

清苦是佳事。虽然，天下岂有薄于自待，而能厚于待人者乎？

闻人善则疑之，闻人恶则信之，此满腔杀机也。

看中人，看其大处不走作；看豪杰，看其小处不渗漏。

治国家有二言，曰忙时闲做，闲时忙做。变气质有二

言，曰生处渐熟，熟处渐生。

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顺逆差遣，何曾作得主！

陈继儒生于1558年，卒于1639年，生卒年大致与洪氏相近。上引他所抄录的“四方名贤”之语，有无洪氏的在内，无从证明。但从上述诸语的意境及其遣辞造语来看，应该说也是与洪氏的风格相近的。因此，我们不妨把洪氏《菜根谭》视为那个时代环境下，文人儒士的一种共通心态之反映，很难说谁影响了谁，或者哪个照抄了哪个，总之是互相影响，由此而形成风气。

所有这些文人儒生之言，当然无列入正史之资格，却是不可忽视的。它存在于一大批有相当影响力的士子之中，而且转相呼应，据有正统儒学所难以涉足的一大片精神世界。这是一个“官学”之类的不能牢笼的精神世界。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愿望和要求、苦恼和欣悦，已非原来的儒学，包括理学在内所能概括得了，虽然我们仍不时见到其间流露出来的丝丝儒者之情。

“大一统”之下的文人儒生也真是有苦难言。照说，天下太平应该是盛世到来，接近于理想世界的实现的，只要大家齐心合力，照着儒学之说做去，自然功到而成。然而这个大一统，偏偏不是依照人们的心思而来的，而是完全依照另一种法则“打出来”的。在如此的社会环境之中，所有文人儒生的理想，不可避免地要落于点缀之景，而究竟不是实质性的内容。朱元璋不就已经把孟子从儒家圣坛上“驱逐”出去了么，理由无非就是他有教唆臣民造反之嫌。其实孟子哪里有什么“大一统”的经验，他只是依照他那个时代而自说自话罢了，不料竟落得千年之后的这番遭遇！朱元璋此举，无疑是向文人儒生发出信号：忠君是第一位的，而道义之说，则不能脱离此标准来谈，否则就不在不赦之列。孟子所处的那个“处士横议”时代，在中国大约是一去不复返了吧？而后世的文人儒生，仍是不晓变通，仍是坚持心目中的道义之说，这就不免大苦。而此时此际，佛道思想的“随缘说法”、“随缘而度”，就有着正统儒学所无可比拟的效

用。读书人既入世不得，权且出世，权且游世，权且随世适世一番，也就成为不期而然之事了。

四

《菜根谭》一书，在明清人看来，该是属于谈“性命之学”的，这一点前已述及。这里可以补充的是，该书问世后不久，即被收入，并见附于《遵生八笺》一书之后。《遵生八笺》一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是“以闲适消遣之事，分为八类，故曰八笺”。这八类是：清修妙论，四时调摄，起居安乐，延生祛病，饮饌服食，燕闲清赏，灵秘丹药，尘外遐举。《菜根谭》得附其后，想来是被当作“遵生”的作品来看待的，也就是有其该方面的参考价值。

《菜根谭》大约可与《遵生八笺》的“清修”、“清赏”挂起号来。所谓“修”，即是修养心性的意思。而“赏”，无非是前者的辅助手段。看《菜根谭》一书，似乎也不外乎此。修养心性与赏心乐事二者不可或离，它们可以，或者说也已经塑造出一种为人的品格来。所谓的“遵生”，不仅仅是指的生命肉体及其奉养方面的事情，而是对于生命的整个领受。所谓“整个领受”，其实对于人类来说，就是通过感受和领悟，了解到生命本体的究竟，并且依照这个根本来生活，从而坦然安详地担当起自己此生以及自我存在方式的转换。这在古代，被称为“悟道”、“得道”，在禅宗说来，是“见性成佛”，都是被认为根本大事，是人生万事中的头等大事。

人生多苦辛，产生这种思想是合情合理的。而这种思想在某些个体、某部作品中的体现程度，往往是我们认识该个体、该作品的依据。据此，我们可以对《菜根谭》作一番认识。

看《菜根谭》一书，当挈其纲领。纲领并非指其人生至高境界，而是其展开全书各个方面论述的几条线索。我们且看如下一段话：

读书不见圣贤为铅槧佣。居官不爱子民为衣冠盗。讲

学不尚躬行为口头禅。立业不思种德为眼前花。

这里讲了四个方面的要求，可以视之为作者撰写此书的四个触须，全书所述，无非此四方面的铺张而已。

读书人所为何事？无非居官与讲学。二者的极致，就称为“立业”。立业是为学至大者、至高者，而根基仍在读书。读书而见得圣贤之心，则立业有其本，也就是真能种得德来。于是，居官、讲学都是能够胜任的。不明就里者，也许会诧异：作者不是已经退隐了吗？既已栖心禅寂，难道还有心思谈到宦宦生涯？其实，作者并未忘情于此。请看：

富贵名誉，自道德来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
自功业来者，如盆槛中花，便有迁徙废兴；若以权力得者，
如瓶钵中花，其根不植，其萎可立而待也。

这里，所关注的仍是富贵名誉一路，只不过理解上重在“种德”而已。作者另有一言：

春至时和，花尚铺一段好色，鸟且啭几句好音。士君子幸列头角，复遇温饱，不思立好言，行好事，虽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

这句话如果单独看，恐怕难以确认其所言对象，而拿来同另一句“花逞春光，一番雨，一番风，催归尘土；竹坚雅操，几朝霜，几朝雪，傲就琅玕”相对照，就可知他所说的“春光”、“花”，无非是指富贵功名及其时机罢了。又诸如“居官有二语曰：惟公则生明，惟廉则生威。居家有二语曰：惟恕则平情，惟俭则足用。”更是十足的人世儒生口吻。类似的话语在书中反复出现，表明作者心中仍不时翻起旧情。不过作者毕竟已不是仕途中人，他的处身及其视角，当然要宽裕得多：“处安乐之场，当体患难景况；立旁观之地，要知当局苦衷；理现成之事，宜审创始艰辛。”

一旦从名利场中退出，心境自然两样。因此，我们看到这样的说法，自是不必稀奇：